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

李国钧 著

-092.49
2

人
社

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

李国钧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

李国钧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　插页 2　字数 5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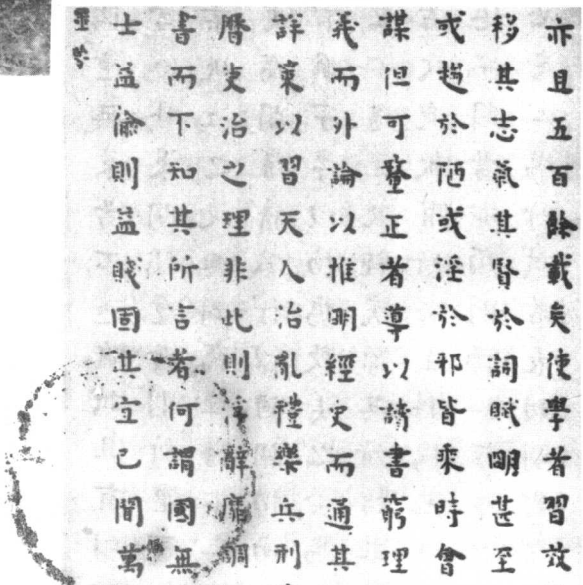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7500

书号 7012·0699　　定价 0.45 元

王船山画像

王船山讲学和从事著述的地方 —— 湘西草堂



王船山《噩梦》手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　生平和教育活动……1
二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6
（一）“政立民安”而“学校兴”……6
（二）文教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13
三　培养理想人格的“成性”说……18
（一）教育可以发展和增强“天性”……19
（二）教育可以形成后天的“习性”……24
（三）教育可以变革“恶习”……32
四　教学思想……41
（一）教学是启发学者“自悟”的“受业”过程……41
（二）“学思相资”，以思为主……43
（三）教学当“深知其心”“因材而授”……48
（四）“学有当务”而“教必著行”……53
（五）教学当有“恒教事”、“知自明”和“不泥古”的教师……60
五　论“蒙童”教育……65
（一）对儿童及其教育的观点……65
（二）对儿童教育内容的主张……69
（三）儿童作诗文训练的原则……72
六　王船山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77

一　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船山生于一六一九年，卒于一六九二年。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亡后，隐居湘西石船山，故被后人称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父祖几代以"诗礼传家"。高祖王宁，就开始"以文墨教子弟"，曾祖王雍，"以文名著南楚，由岁贡荐武冈州训导，迁江西南城教谕"①，从事教育工作。父王朝聘，以"副第贡太学"，在京师国子监受业，卒业后，因不得志，而归乡教书。王船山自幼受父兄家教，四岁入家塾，跟兄王介之受读，七岁时即读毕《十三经》，十岁从父受经义，十四岁考中秀才。再稍长，即出门就师问道，曾考入衡阳县学，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四岁时考取举人。王船山对经史诸子百家之学均致力学习，"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②，终于成为我国十七世纪一位学问渊博、著作宏富的大学者。他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以及教育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见解，反映着时代精神的思想光辉。

十七世纪的中国，在社会发展和学术思想发展方面，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当时的先进思想家，包括王船山本人，都已预感到"天崩地解"的来临，"天下亦变矣"的社会发展趋势。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延颈待雇"，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的商品货币关系，就是明证。这在王船山的思想中，已

① 《姜斋文集》卷十，《家世节录》。

② 王敔：《姜斋公行述》。

有所反映。他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①，公开表示对未来"大贾富民"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憧憬。但是，当时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同顽强的封建经济相比较，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虽反映了封建社会及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力量还是很微弱的。而直接威胁着明王朝存亡的，却是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阶级矛盾和清兵入关的民族矛盾。王船山正确地认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贵族官僚豪绅"剥民以致"②。因而，他在农民起义的刺激下，很不满意豪强权贵势力和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反对封建贵族和豪强地主疯狂的土地兼并及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田)"③，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他并不同情农民的起义，也不支持农民军抗击清兵。当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清贵族打败农民军，在北京建立了清政权，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并举兵南下时，王船山"举义兵于衡阳"，抗击南下清兵。他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因南明腐败无能，不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曾三次上疏，要求改革，并主张弹劾结党营私的王化澄，因而遭到当权者王化澄的迫害，几丧性命，"有降帅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④从此，他又脱离了南明政权，满怀忧愤，展转湘西，浪游郴、永、涟、邵间。最后，他归衡阳，筑土室于石船山，杜门著述，勤恳讲学，达四十年之久。

王船山的著作实践和教学活动，是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和政治环境中进行的。他不向清统治者屈服，也不顾清统治者的迫害，隐身于"良禽过而不棲"的恶劣荒野，自筑土室居住，坚决地拿起笔作刀枪，继续战斗。当时清朝的官吏，经常派暗探监视他的活

① 《黄书·大正第六》。
② 《读通鉴论》卷十。
③ 《噩梦》。
④ 王敔：《姜斋公行述》。

动，他面临着随时都有被捕的不测遭遇。正如他在《斋中守犬铭》里所记述的："危机之触，接于几席"，常常"中夜不能寐"。他有时为了看望同时避难的兄弟，还得乘夜间由弟子陪去，可知其行动的不自由，达到了何等地步！

在生活上，他也是极端贫困的，"严寒一敝麻衣，一襦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①。经常自樵自炊，有时甚至以野果野菜为食。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短襟自寒，朔风摇缸；岁暮薇枯，饥谁与同？"②这正是他当时饥寒交迫情景的逼真写照。

在王船山的后半生中，无不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发奋著书，越到晚年越坚苦奋斗。这正如他的儿子王敔所描述的："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③他先后完成了《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庄子通》、《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俟解》、《噩梦》、《读通鉴论》等一百余种，共四百多卷，约七百万字的学术巨著。尤其可贵的，他的许多著作，是在康熙一手拿刀，大兴文字狱，一手拿笔，以各种所谓"御纂"、"钦定"的名义，恢复程朱正宗理学唯心主义思想统治时期写成的。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的学说，而且总结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并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为许多学术别开生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把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及教育等某些内容加以丰富了，有些还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王船山从三十三岁以后，脱离南明政权，便隐居山中，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战斗生活，即除著作活动外，就是对"及门诸子讲学"。他把巨大的学术研究工作与长期的教学活动结合了起来，有时是

① 《夕堂永日绪论》曾载阳、曾载述《附识》。

② 《五十自定稿》丁未《杂诗》。

③ 王敔：《姜斋公行述》。

先作学术研究，然后用研究的成果来教弟子，如《礼记章句》、《周易内传》等，都是为"授徒计"而写的；有时则先口授，而后整理成书，如《春秋家说》、《四书训义》等，都是当时教弟子们的"口授讲章"，有问有答。

在教学过程中，他对以往的教材和思想资料，总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以此启发弟子们。王船山坚持战斗唯物主义的路线，对各种唯心主义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也贯串在他的教学工作中。他在对弟子们施教的过程中，经常为诸生"剖示学术的源流"，分清唯物与唯心两种理论体系的发展径脉，以继承并发展"张横渠之正学"，来克服理学、心学的谬误，使弟子们深知"朱陆之异同"及"心学之谬误"。① 他从认识论与本体论上来打击陆王，改造程朱，狠批玄佛，把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王船山的教育实践和著作活动一样，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进行的，但他却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死为止。他为诸生的"请业问道"，往往是夜以继日的讲授。他的儿子王敔述说其教学生活时，曾有这样一段故事，王船山与"从游诸子"，讲所注《礼记》，常常夜谈至鸡鸣。有一天夜里，北风呼啸，寒冷异常，而船山先生却讲学不止，有盗贼者至，"窃听而异之，相戒无犯焉"。他的教学精神，人范态度，甚至感动了盗贼。更可贵的是，他虽身染重病，仍以鞠躬尽瘁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毅力，进行教学工作。在他六十七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因为他久病体弱，"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不能为弟子们口授讲说，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指《周易内传》——笔者）"②，用来函授诸生，以"恒其教事"。这种情况，在他六十岁以后是常有的事，一直到年近七十，久病哮喘，身体日

① 王之春：《王船山公年谱》。

② 王船山：《周易内传跋》，又见王之春：《王船山公年谱》。

衰，才“从游者渐少”。但仍努力撰著，如《读通鉴论》与《宋论》，这两部系统的史论巨著，就是晚年奋力完成的。

王船山与弟子们在同甘共苦中，建立了师生间的深厚感情。他的后半生，许多时间是与从游诸生及故友共同度过的。当时，他连吃饭都有困难，往往与弟子们“昼共食蕨，夜共燃藜”，吃山中的野菜野果，冬天自樵野草取暖以御寒。就是著书写讲义的纸头都没有，“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① 他的生活来源，也多靠门生资助。王船山三十三岁时，就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南明避居邵阳，初“寄居无定所”，后来“主于罗从义家”，“教其子瑄”读书②，罗瑄后成名儒。三十六岁时，为避清兵侦缉，又流亡“常宁山中授徒自给”，靠收几个学生教书为生。他开始设馆教学时，连讲堂都没有。三十七岁时，由常宁“迁居郴州兴宁山中，借僧寺授徒，为从游诸子说《春秋》。”③后来学生日多，徙归“续梦庵”，四十二岁时，又筑茅舍，名“败叶庐”，不久又添造了“观生堂”，最后于康熙十四年，时王氏年五十七岁，在石船山下二里许，又筑茅舍，名“湘西草堂”。这都是一些极简陋的土室茅屋，为的是解决日益增多的学生住宿问题。而设馆授徒，又是他用以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不仅他自己如此热心的办教育，招收门徒，还叫高足弟子章有谟到朱翠涛家教书，扩大其学术思想影响。

王船山的儿子王敔，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也曾在“湘西草堂”“聚徒课业”，教授蒙童。到他六十岁时，“从游者数十人”，酿金为他祝寿，王敔就用这些钱，又重修了“湘西草堂”，以纪念其父坚苦勤奋地在草堂著书和办教育的业绩。并与“从游之有志者”，刻王船山先生遗书数种，在“湘西草堂”学舍讲读，使船山先生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播。

①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② 罗正钧纂：《船山师友记》卷八。
③ 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二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在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王船山精辟地论述了学校的兴衰决定于“政立民安”，教育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依赖于社会经济，反过来教育对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亦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政立民安”而“学校兴”

王船山的教育思想，最富于结合实际。当他谈到教育同政治的关系时，总是从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和怀念明朝故国、反对清贵族的民族压迫出发，来论述教育的问题。这与他早期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活动有密切关系，也和他晚年受清统治者的迫害，处境艰危分不开的。所以，在王船山的著作中，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爱国思想特别突出，其名著《黄书》，就是一篇“民族宣言”，如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均是我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在王船山的思想中，充满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他说：

> “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旷，足

以固其族而无忧矣。"①

王船山在这里揭露和批判了"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用教育来"濯愚"，"立庠序，讲正学"，以造成大批"仁育义植之士"；再利用政治上的改革来"刷耻"，以拨乱"成治"；政、教齐施，就可以"固其族而无忧"，把教育作为"育士"强国的"财、兵、智"三纲领之一。

"述往以为来者师"。王船山回顾和总结了二千年来的历史，"尽古今兴亡之理"，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政、教两大端。但是，两者有先后本末之分，论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论本末，则"教本也"。②这种关系处理得恰当，就会促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如秦用商鞅，重刑政而轻文教，始皇死后而"秦无人"，这不是因为秦朝"乏才"，而是因为"无以养之也"；蜀国之所以灭亡，也不是因为蜀国"乏才"，而是由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他们国祚短暂，速而亡国的原因之一，皆为"失其育才"。③到了宋代以后，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盛行，而唯物主义却"信从者寡"，致使学校虽存，而培养出来的人，多"无益于世"。他特别痛心地回顾了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其一即是"教化日衰"，官学教育"名存实亡"，士无所步趋而进退，因而"廉耻风衰"，未能"教行化美"，亦未能"造士成材"。学者在唯心主义理学的毒害下，"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④当国家危亡之时，却无半策"扶危济难"的本领，只好临危"一死报君恩"，把人民的锦绣山河，拱手让于清贵族，使各族人民均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

王船山抱着缅怀往事，忧危大局的心情，进一步分析了当时教

① 《黄书·宰制第三》。
② 《礼记章句》卷五。
③ 《读通鉴论》卷五。
④ 《读通鉴论》卷一七。

育方面的弊端：一是由于唯心主义理学教育的盛行，对士子思想统治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蚀其心思”，“荒其日月”，人们的心灵被腐蚀，年华被销糜，到了明末，已经是积重难返，天子不识国家之贫富，“大臣不言钱谷”，而“自矜高洁之名”，实是“忘立国之本”的“土木偶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知“词章”、“天人性命”，而对于“当世出纳之经制，积聚之盈歉，未有过而问者”。王船山认为培养这种“学之不适于用”的人，将来为政，必然要被“小人”所摆布；二是“锢蔽于腐诗时文中”的取士制度，已“日暮涂穷”，其“坏人心，乱风俗”已达极点。学者多是为富贵利禄而学，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直是“教以利，学以利”，结果“无心无目”的俗儒遍天下，他们鼠目寸光，只知追名逐利，而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则置之脑后；三是一部分士子，不满谈心性的“虚学”，而闭门“专经保残”，记诵“词章”，把自己的眼界“陷于寻丈之间”，虽读万卷书，却“不能启其愚”，反而“益其愚”，“止以导迷”，愈学对“时政”愈胡涂，根本谈不上“适时合用”。他深刻地批判这种教育是使学者：

> 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①

王船山主张为学要有高明的度量，远大深沉的志向，才能“博识深通”，才能德业日益精深和盛大，将来能为国家创建功业，为社会作出实际贡献。他基于这种人才观，所以非常鄙视那抱残守缺，“精于训诂”的“小儒”，认为他们只能“数《五经》、《论》、《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校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为工。”② 结果是无益于“身心”，无益于“伦物”，无关于“政教”。他表示自己重“致用”，而与宋学之空虚、汉学之繁琐异趣。他认为读书的目标，在于“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③他主张“体”、

①②③ 《读通鉴论》卷一七。

"用"结合，教育要"适时合用"，才能造就"今日之才"的人，希望能培养出参预国家政治的真正人才，使"民安而天下治"。可是，当时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同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一样，已将走到尽头，呈现出一片暗淡无光的没落景象，预兆着终究要被新的教育所代替。这时，以农民革命战争和市民运动为背景的政治上的革新与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思潮，已经出现，前有"东林"之清议，后有"复社"的斗争。王船山在这种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同时更由于明朝的灭亡和清统治者的压迫，他引以为沉痛的教训，而"哀其所败，原其所据"①隐迹深山，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提出了一些变革政治和改革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当世的教育，"长此不革"，则"师道贱，而教无术"；"教无术"，而将来"谋国者"亦"无术"，其"贻祸无穷"。历史的与现实的教训，"可以为永鉴也已！"②

王船山认为，当时的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不足以造就真正的人才。其改革的措施是：

一、不仅要"以文教为重"，重视教育的发展，而且文化教育大权，要同政权、兵权一样，不可"旁落"于"小人"之手，应该在皇帝统属下，"壹以文教"之权。王船山是反对阉党集团腐朽势力的，他在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要避免文教大权落于阉党手中，使国家不能"以学校为取舍人才"之所，反而使"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国家用人不出自学校，而出于阉党，这种局面不能再现了！

二、他希望帝王要"以公天下之心，扶进人才"③，从务实求治的思想出发，培养有真才实学、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才。因此，要切实培养人才："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树

---

① 《黄书·后序》。

② 《噩梦》。

③ 《读通鉴论》卷一一。

人者而已矣。操树人之权者，君也。"①君能树人，亦得能用人，"选贤任能"，但对待人才，也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有可用之处，即用其所长。所以，王船山指出：

"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谋果毅者，短长相间，瑕瑜相杂，多不能纯。察之密，待之严，则无以自全而或见弃，即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矣。"②

王船山之言，是有所指而发的，当时崇祯帝对于臣僚，就是"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求误"，因而"诸臣畏罪饰非，不肯进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③因此，"操树人之权"者，必须善于掌握"宽大养人之法"和"选贤任能"之术。后来者不可不慎！

三、学用结合。王船山的思想，愈到晚年，愈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④力图将学与用、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读书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为"修己治人"的当世之用。他说：

"夫读书将何以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⑤

他在评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说：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⑥

---

① 《读通鉴论》卷一四。
② 《读通鉴论》卷一〇。
③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刘宗周传》。
④ 《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
⑤ 《读通鉴论》卷一七。
⑥ 《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书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为“当世之务”所用，古人的著述，也是为“明道淑世之功”。他主张“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要士子学习多方面的“实学”，研习“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非此则浮辞靡调”不革，国家终不能有“可用之士”。“登士于实学”，也是“科场救弊之道也”。[①]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养之士，明道而救世。

四、文武结合。王船山认为，在“定治”之后，而要“安天下”，当以“文教为重”，“用贤兴教”，而不能“专于致武”；应该是在创立政权打天下时“不贱诗书”，在“守成”治理国家时“不忘武备”，把文与武结合起来，“纳天下于揆文奋武之治”，这是治国安邦的总政策。在学校中，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必须文武兼学，“教之以文”，也应“教之以武”，既能作士，又能学农、学工、学商。他晚年留给子孙的家训中说：“能士则士，次则医，次则农，农、工、商贾，各惟其力。”[②]这种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反映了明末以后社会上一般市民的要求。

王船山既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教育的“极弊”，又提出了一些改革的主张。但是，只有首先革新政治，变了“旧法”之后，才可能推行教育改革的措施。同时，政治革新之后，就要“择人”管理国家政事，“既变其法，又待其人”[③]。若不是“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的选拔任用人才标准，“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即使有了“变法”后的新政治，也不一定得治。还因为“治惟其人，不惟其法”。[④]所以，“用人”与“行政”必须一致起来，才能得治。故他说：“用人与行

① 《〈噩梦〉》。

② 王之春：《王船山公年谱》。

③ 《张子正蒙注》卷五《作者篇》。

④ 《读通鉴论》卷一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